

watch|上证观察家

# 让国内资本更多分享经济增长成果

改革开放至上个世纪末,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投资和出口,而外资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换个角度说,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当一部分收益被外来资本收入囊中。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技术创新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即使有,也主要是来自国内资本的推动,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综合国力迫在眉睫,这不简单是一个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更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立足于世界的基石。

□杨英杰

储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新古典增长模型的一个核心议题。这些增长模型普遍认为资本集聚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即高储蓄率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因为高储蓄率能满足高资本投资的需要。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东亚国家与拉美国家的对比。1960年到2000年,东亚国家的平均储蓄率为25%,而拉美国家除了智利(平均储蓄率为20%)外,平均储蓄率仅为14%。研究表明,智利在1960年至2000年间单位劳动者GDP年均增长率几近2%,高储蓄率功不可没;东亚国家的经济腾飞更是得益于此。

最近的模型则强调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认为贫穷国家通过技术创新是能够以较快的速度推动经济增长的,增长途径则是通过吸引能够带来技术领先的国外直接投资。在发现新技术能带来巨大利润的过程中,国内资金可以通过为国内企业融资而促进国内企业在追赶世界先进技术的同时,推动本国经济不断发展。因此,国内储蓄对于技术创

新以及经济增长都至关重要。

总而言之,高储蓄率对于一国经济增长,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来说,处于十分关键的地位。事实求是地说,对于我国经济增长而言,1990年代以前,高储蓄率确实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急需的资金,而且投资-储蓄缺口压力颇大,大力吸引外资成了当时从地方到中央的共识。但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内经济发展产生的充裕资金的日趋增多,以及国际上自由资本的全球化流动加速,国内投资-储蓄缺口转变为储蓄-投资缺口。所谓储蓄-投资缺口,是指投资率低于储蓄率,在储蓄与投资之间出现缺口,从而储蓄未能全部转化为投资的一种现象。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投资率一直较高,但自1994年开始,我国的储蓄率一直高于投资率,储蓄-投资缺口始终存在,且近两年来的储蓄-投资缺口出现扩大趋势。

伴随着储蓄-投资缺口不断扩大的同时,外商直接投资(FDI)尽管在个别年份因受到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有所下降

外,几乎平均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速。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在国内资金非常充裕的情况下大量外资仍然流入?看似奇怪其实很容易理解,原因只有一个,资本回报率。至于为什么资本回报率高,有两个原因,一是各种对于外资的优惠措施如低税率提高与外资资本的回回报率;二是在与国外资本竞争的过程中,国外资本占据了上风,因此高回报项目也花落人家。就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益处而言,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技术转移或溢出效应。商务部去年发布的《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也提到,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结果是核心技术缺乏这一问题。可以说,对于外资在提升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中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

为什么国外资本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回报率和更高的投资机会,当然这里有随国外资本而来的天然对于利润敏感的嗅觉,也有伴随资本而来的更高的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更有国内制度设计对于国内国外资本的不同待

遇或某种程度的歧视,也有国内资本市场自身存在的缺陷如金融中介的不发达、寻找高回报项目的成本过高等因素。我们这里不想全面分析为什么会出国内资本受到国外资本挤压这一问题,只是想提出这样一个现象:即国内资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与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态势不符,或者说是经济增长对于国内资本特别是储蓄资本的敏感性日渐缺乏。

改革开放至上个世纪末,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投资和出口,而外资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换个角度说,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当一部分收益被外来资本收入囊中。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技术创新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即使有,也主要是来自国内资本的推动。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综合国力迫在眉睫,这不简单是一个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更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立足于世界的基石。这恐怕是我国政府及时提出创新型国家战略的一个主要原因。

可以看出,如何提高国内资本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作

用,已不只是一个让国内资本能及时公平地获取经济发展收益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需的一部分(主要表现为国内储蓄为居民的主要资产,国内资本的收益将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此,而国内资本的收益的获取也将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回流至居民手中),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一个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有利环境中,加快培育国内资本的竞争力。

我们必须未雨绸缪,一旦出现不可预知的社会经济风险,外资撤离的真空必须由国内资本来弥补,否则后果将极其严重。事实上,国外储蓄仅能部分满足国内投资的需要,而只有国内储蓄才能为大部分投资融通资金,并支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鉴于此,我们认为,培育国内资本的竞争力,除了加强金融体系的建设,完善资本市场等制度建设之外,应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大背景下,因势利导,转变国内资本流向,将国内资本纳入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样既能充分利用当前国内资本充裕的优势,也能够使国内资本在一个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推动力的未来经济发展主导模式中占据优势地位。

(作者为中央党校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voice|上证名记者

## 要理性看待市场也要理性看待调控

□倪小林

央行出手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引起多方人士对于春节以后股市的种种猜测,开市第一天的情况一如多数人所预计,上调存款准备金对于市场影响有限,股指还是站在了3000点上。笔者认为节后开市的第一天,投资者给调控政策投了理性的一票。

春节以前,人们对于活跃的股市议论很多,是泡沫在聚集,还是繁荣正在显现?唱多者说经过一年多股权分置改革,市场出现持续上涨很大程度是因为长时间的低迷所致,恢复人气说明百姓对于未来中国经济有信心。唱衰者的结论则截然相反,股市走好了,但人们感觉如此不同,是受证券市场的普遍认知规律左右,在市场上时有人看到风险多,市场下行时有人千方百计寻找希望,我们不过在历史上时时期经常遇到的情况罢了。投资的收益往往容易令人对市场产生非理性行为,所以提示人们要理性看待市场,也是一般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责任。

不过中国股市2007年的故事,用一般的规律去解释,还不足以获得正确的认知,毕竟我们的市场和调控艺术都处在成长阶段,娴熟的调控一定是来自成熟的市场,二者不可偏颇。我国改革开放以后股市“上等级”的发展还不到20年,对于市场的繁荣和调控政策频频出台,我们容易过度反应当然不足为怪。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不少人自动对号,认为是剑指股市,就是对于宏观调控的一种反应。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苦心寻找培养成熟投资者的方法,投资者教育从课堂走向证券营业厅,为的是让投资者跟上市场发展的步伐,学会驾驭股市投资的本领。其实谁都知道,真正的投资者教育课堂就是股市本身,在2007年短短一个多月里,投资者已

经历了起伏500点的大调整,这本身就是对投资者最好的教育。如果说投资者认同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执意不离场,实际上也是反过来对调控者提出了新的要求。

笔者综合财经界人士对2007年经济形势的分析发现,2007年多被认同为经济将继续平稳增长,虽然增幅有可能放缓,但是经过结构优化之后,资本市场的地位将进一步上升,投资者的收益也会随企业实力的增强而增加。而2007年也将会是变动最活跃的一年,因为还有很多的结构性矛盾必然反应到市场末端,也就是说股市的大发展无可厚非,但是市场会出现曲折向上发展的态势。这倒不是说股市自身有什么问题,而是中国股市会受到新兴市场的影响,甚至欧美市场的影响,也会受到全球资金流动量和速度的影响,以及本国经济自身调整的影响。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宏观调控也将会变换多种方式,以应对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要投资者理性看待市场,那么我们也必须理性看待宏观经济调控。多年来我们苦于难解“政策市”的羁绊,股指长期随政策变化而变化,这在市场发展初期容易理解,但是我们毕竟不能够“两次经过同一条河流”,诚如经济界人士所言,目前我国经济已经表现出这样的局面:人民币汇率调整政策已经加大;股市市值的扩大更多来自融资,股指升幅可控,我们容易过度反应当然不足为怪。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不少人自动对号,认为是剑指股市,就是对于宏观调控的一种反应。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苦心寻找培养成熟投资者的方法,投资者教育从课堂走向证券营业厅,为的是让投资者跟上市场发展的步伐,学会驾驭股市投资的本领。其实谁都知道,真正的投资者教育课堂就是股市本身,在2007年短短一个多月里,投资者已

## 经济发展应为弱者提供机会



漫画:刘道伟

□王杰

今年下半年起,上海市民无需再为修鞋、修伞等琐事而四处寻寻觅觅。据报道,上海市(城市设置摊点)即将出炉,并于下半年正式开始实施。上海市市容局环卫处处长孙芝兴介绍说:“上海无证摊贩可能在5万以上,光靠堵是行不通的。而且有些摊点确实便利了居民生活,因此我们允许城市区域一部分小摊小贩的存在,给他们颁发临时许可证。”

不知从何时起,我国大小城市都对所谓的形象重视起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碟中谍3》三度送审,国家电影局审查,在删掉了上海市晾晒内衣的生活场景后方才通过,原因是这些场景被认为丑化了上海的城市形象。至于对小摊小贩的驱赶,更是各个大小城市的一大特色。由此闹出了许多悲剧,小商贩被殴打与城管受伤等焦点新闻不断见诸于报端。这次,上海市允许城市区域一部分小摊小贩的存在,走出了城市形象凌驾于民生问题的局限,可以说是一大进步。

实际上,小商贩之所以能够生存,甚至在被驱赶下还能维持,主要原因在于两点:一是市场有此需求,这是让小摊贩得以存在的市场基础。二是许多小摊贩没有更好的就业机会,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无论这两个因素哪个更多一些,至少都说明摊贩的存在有其合理性。认清这一点对于城市的管理者调整管理思路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强行取缔小摊贩其实并没有可行性。

事实上,不仅中国,就连西方发达国家也都有商贩的存在。比如美国,仅纽约市目前就有12万多名有执照的街头小贩。在曼哈顿下城的小贩,46%的经营者卖食品和旅游品,还有28%的出售文化产品。外国游客来到纽约,并不觉得街头小贩有碍市容。街头小贩主要集中在百老汇、唐人街、炮台公园等地,他们大多守法经营,为纽约的繁荣

和税收做了不少贡献。再比如法国,只要摊贩总体上不扰乱社会秩序、不影响交通秩序、不予干涉,而且,为了避免摊贩到处乱跑,同时方便市场,法国巴黎市政府将巴黎市区接近环城路的各个城门附近的街道,在一周时间内分别辟为举办跳蚤市场的地点,相关的交通管制提前公布于众,并成为一项制度,定时、定地、轮流举办以方便摊贩。法国对摊贩采取的办法是“疏”而不是“堵”的办法,通过为摊贩提供良好的服务——如道路、通水、通电、垃圾处理、环境保护、行业技术培训、相关行业的信息等等,为这些弱者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不让他们产生被城市遗弃的感觉。因此,这些摊贩也常常“乐呵呵的,一副满足的神情”。

我国虽然连续数年保持经济的高速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2005年,我国人均GDP为1703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25,日本的1/21),就业机会还非常缺乏,许多弱势群体除了摆摊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摆摊常常成为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如果为了所谓的城市面貌对他们进行驱赶,堵住他们的生存之路,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整建立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一系列问题。

经济发展不能抛弃弱者,应该给弱者机会。在2月26日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就业促进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失业预警制度,预防、调节和控制可能出现的较大规模的失业。这意味着,国家将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和更人性化的措施来促进就业,而摊贩本身无疑也是实现就业、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的一个途径。

因此,给摊贩机会,不仅有益于摊贩的生存和发展,也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政府应该采取措施,要求各地都像上海那样,给摊贩就业的机会而不是四处驱赶他们,甚至毁灭他们的希望。

## 药品定价的重心在成本透明

□予人

2月25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医药价格工作守则》(暂行),规定从3月1日起,制定医药价格,必须经过成本价格调查、专家评审或论证、听取各方面意见、集体讨论、集体审议等五道程序。

药价虚高问题连年遭到公众的批评,有关部门也在不断采取措施。最典型的做法是药品降价,国家发改委已经连续进行了21次药品调价工作,但是,一些药品不降反涨,老百姓并没有真正得到实惠。那么,药品定价价须过“五关”的规定能够降低药价吗?

《守则》所规定的五个环节,最核心的一个环节或者说最核心的一环在于成本透明,如果能够做到成本透明,药品定价机制就会逐渐使药品去掉过多的水分而回归其本来价值,设若成本不透明,无论经过多少环节,都难以使药品定价趋于合理。

现在,我们尚且无法对药品定价中的成本透明问题抱以

信心。发改委这次出台的《守则》,涉及到的相关定价程序,尤其成本审查这一至关重要的环节,在过去的类似政策中曾有规定。如,2002年11月1日发布的《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成本监审暂行办法》规定,“列入成本监审目录的商品和服务,未经审核经营者的成本或未经核算价格成本的,不得制定或调整价格”。2006年4月,国家发改委制定的《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也明确规定,凡是需要实行听证定价的商品和服务,都要进行成本监审,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在调查、测算、审核经营者成本基础上核定定价成本。

实际上,由于成本监审不透明,所谓的成本透明根本无法达到,暗箱操作现象屡屡发生,导致成本监审有名无实,水、电、天然气等涨了又涨。正因为有前车之鉴,这次我们才需要格外警惕。发改委出台的《守则》规定,在药品定价方案出台之前,必须经过进驻企业进行成本调查的过程,且要有两名以上医药价格管理工作人

员参加。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很难真正得到执行。我国有6000多家药厂、几万个品种规格的药品,以价格监管部门现有的人力,恐怕很难做到认真核定药品真实成本,也就是说,发改委此次有关药品定价须过“五关”的规定,存在着执行上的现实难题,如果这一问题解决不了,过“五关”的规定就有可能架空。

退一步说,即使人力跟不上,如何避免暗箱操作,确保成本价格透明的公开、透明也是一大难题。医疗领域的商业贿赂现象之严重人尽皆知,比如被曝光的国家药监局腐败案,仅2004一年,药监局便受理了10009种新药报批,而同期美国药监局只受理新药报批148种。在利益面前,那么多重量级的药监官员尚被拉下水,如何确保医药价格管理工作人员不受利益诱惑而忠于职守呢?

因此,药品定价虽然环节多达五个,但重心却在成本透明,只有做到成本透明,药品定价才能趋于合理。

## 解剖一下杨荣昌这只“麻雀”

□周俊生

杨荣昌是谁?他现在的身份是被上海市检察院二分院依法批准逮捕的一个涉嫌经济犯罪的人,此前,他的身份是上海市虹北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的总经理。这个虹北公司不是上市公司,不用搞信息披露,因此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这个总经理职务是否已经被解除。

在浩浩荡荡如过江之鲫般的腐败分子队伍中,这个杨荣昌也许是排不上号的。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却很有点典型性。最新一期《新民周刊》揭露了此人的丑恶嘴脸,我们不妨把他当作一只“麻雀”来解剖一番,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腐败分子是如何在堂而皇之的口号下,利用企业转制的机会一步步地蚕食国有资产,盘剥职工利益的。

杨荣昌任职的虹北公司,原先是一家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有许多资金搁死在一个“烂尾楼”上,据说杨荣昌一出场,问题就解决了,不知道他用了什么“灵丹妙药”,就使这个“烂尾楼”活了起来。杨荣昌趁热打铁,向上级部门中虹集团提出了改制的建议,并很快得到了批

准,虹北公司的资产被评估为1000万元,由中虹集团持股30%,杨荣昌个人持股70%。第一个问题在这里出现了,既然持股70%,即使按内部优惠价,杨荣昌也必须拿出400多万元真金白银。在此之前,杨荣昌只是虹北公司的一个国家干部,他从哪里拿出这400多万元?原来,他是用虹北公司资金垫付给中虹集团,这种游戏实际上是中虹集团把一个下属企业70%的股权送给了杨荣昌。就这样,杨荣昌由于有了公司老总的身分这个特权,他可以自己一不花一分钱,就把一个国有企业占为己有。普通职工中即使有人真拿出这笔巨款,要想染指转制企业,谈也不谈。对中虹集团来说,表面上账做平了,但对杨荣昌来说,一个国有企业就这样改头换面,成了他的私人资产。我们不能不悲哀地承认,这正是目前一些国企改制中常见的“路线图”。

这次改制以后,虹北公司已改变了国有企业的性质,但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虽然杨荣昌已经成为这家私营企业的老板,可是他居然仍然握着中虹集团另外两家仍是国

有特无恐。但是,类似杨荣昌这样的“能人”,在今天的企业里实在已经司空见惯了。既然中虹集团的两家国企仍在杨荣昌的手下,他自然是要“有所作为”的。杨荣昌提出,要把其中的一家国银公司的房产卖给虹北公司,尽管中虹集团知道虹北公司事实上拿不出钱来购买国银公司价值2400万元的房产,但集团还是一口答应,而且居然以600万元拍板成交了。实际上,真正的买家是一家医药公司,仅仅在几天以后,国银公司的这一房产就以1800万元的价格出售,杨荣昌坐收渔利1200万元。

第三个问题在这里又出现了,明明是2400万元的房产,中虹集团怎么愿意以600万元就卖出呢?其实,只要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看出其中的问题。在办理过户手续时,财务人员曾经对办事人员发问:“是不是你将房价写错了,怎么能把5000平方价值几千万的房产以600万元卖给你们?”办事人员自然无法回答,于是过户也没办成。报道中写道:“杨荣昌知悉后,动脑筋把此事解决了。”杨荣昌动

□叶蔚

国务院近日召开会议听取北京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情况的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增加供给,引导需求,稳定价格,规范市场,着力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促使房价理性回归最有效的措施是增加有效供给。在今年北京两会期间,市委书记刘淇提及北京将在三年内完成“两个一千万”计划,即“1000万平方米经济适用房、1000万平方米限价房”。研究表明,经济适用房的供给每增加5%,就会迫使房价下降3%-4%。倘若北京的两个1000万计划得到执行,新增的低价房很有可能直接拉低房价,彻底扭转北京房价连调控控控控的局面。

因此,调控房价重在实际行动,倘若对地方政府制定的具体配套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对言行不一的领导进行问责,相信他们会真正两年了,效果并不明显,有些地方房价还越调控越高,根源就在于一些

地方政府根据中央调控政策制定的相关计划没有落实。比如,上海市曾经决定在2005年,确保新开工配套商品房1000万平方米,中低价普通商品房1000万平方米,并可实现预售2000万平方米。上海市宣布的两个1000万举措,立即对市场产生冲击,上海房价应声而涨。但是,由于地方真的推出两个1000万造成房价持续下跌,影响了经济发展,上海市的两个1000万规划基本搁浅,并未得到切实执行。

实际上,在整个房市调控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计划与执行的脱节。每当中央调控政策出台,不少地方政府立即出台配套措施,一旦风声过去,他们又很快将这些措施置之不理,原来的计划成了应景之作。

因此,调控房价重在实际行动,倘若对地方政府制定的具体配套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对言行不一的领导进行问责,相信他们会真正两年了,效果并不明显,有些地方房价还越调控越高,根源就在于一些

的是什么脑筋,报道没有交待,但杨荣昌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人冥思苦索在研究“哥德巴赫猜想”,他要动用许多关系是不用的,用金钱开路也是题中应有之义。那么,那些为虎作伥的人现在在哪里?

通过这一系列的移花接木,偷梁换柱,杀鸡取卵,明抢暗偷,杨荣昌无疑已经成为芸芸众生中“先富起来”的人了。但毫无疑问的是,杨荣昌的“发迹”,正是得力于所谓的国企改革。当国有企业“无厘头”般地消失的时候,当企业职工的正当权益受到严重侵犯的时候,正是杨荣昌之流的腰包日益膨胀的时候,他因国有企业亏损而兴旺,因国有企业破产而发达。

杨荣昌现象并不是孤立的,通过解剖杨荣昌这只“麻雀”,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腐败分子是怎样利用企业转制的机会在化公为私的。如果我们不对这种现象无警醒,依然迷恋于用所谓转制来甩掉亏损企业这个包袱,依然迷恋于用杨荣昌这样的人来包打天下,那么,可以预见的是,一个杨荣昌倒下了,千万个杨荣昌还会“茁壮成长”起来。